

常用公文写作与处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覃卓凡 周隆杰 崔忠仁 等编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赐茂

封面设计：玉荣奖

张文昕

常用公文写作与处理

覃卓凡 周隆杰 崔忠仁等编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10. 6875 印张 字数 220 千

1988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991 年 2 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

印数 15000-31900 册

ISBN 7-5363-0351-3/G · 148 定价 4. 10 元

《常用公文写作与处理》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覃卓凡		
副主编	周隆杰 崔忠仁		
编 委	覃卓凡	周隆杰	崔忠仁
(以姓氏笔划为序)			
	文 军	韦能雄	刘 军
	吕丽芳	李兆方	李勇翔
	张春涛	罗德林	罗国安
	黄 延	崔忠仁	黄家麒
	粟 宁		

在国内宣传上提出了文字简体简化
能为同姓的推广施加有力的公文就能经
过多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推动
改革开放工作的开展。

韦军国

二〇〇六年六月
於盐城

序　　言

《常用公文写作与处理》的出版，向各级文秘人员提供了一本理论联系实际，具有针对性、实用性较强的规范性、权威性的公文写作与处理的工具书，适合广大干部、特别是文秘人员学习。这本书的出版将进一步推动各单位做好公文写作与处理的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公文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发布行政法规和规章，请示和答复问题，指导和商洽工作，报告情况，交流经验的重要工具，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在处理公务中形成的各种书面材料。

公文写作与处理，是党和国家机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机关承上启下，指导工作、协调各方的纽带，它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一份重要文件的制发，往往关系到各方面的工作和每个人的利益，甚至关系到某项事业的成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公文文书的往来越来越频繁，如何适应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需要，做好公文处理工作，提高办文质量，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长期以来，我们对公文写作与处理工作不够重视，许多文秘人员由于缺乏公文写作与处理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致使公文质量不高，效能较差，给工作造成一定损失。在新

的历史时期，我们迫切需要大批具有较高的公文写作水平的文秘人员，因此，普及公文知识，开展公文写作与处理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希望广大文秘人员都读一读《常用公文写作与处理》这本书，掌握和了解公文写作与处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将公文写作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韦鼎桓

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于南宁

前　　言

由广西写作学会名誉会长韦鼎桓作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覃卓凡任主编，周隆杰、崔忠仁任副主编的一部应用写作新书——《常用公文写作与处理》问世了。我作为一名给干部讲应用文写作课的教师，乐意在书的前面说几句话。

公文，即公务文书，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团体单位处理公务的文书。从写作文体来说，属于应用文体的范畴，公文文体历史悠久。公文的发端，也就是中国文章史的起源。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在三千多年前就有公文的记载。《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guài)。”“”，决断，即今天的“应用”。“书契”本指“占卜”、“卜辞”，这里是“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的公文。六经之一的《尚书》，传说为孔子所编。它是我国最早的公文汇编。尚同上，尚书就是上古的公务文书。公文从秦汉以后，开始规范化，文种趋向繁多。“公文”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刘陶传》：“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许多流芳百世的佳作，如李斯的《谏逐客书》、孔融的《论盛孝章书》、诸葛亮的《出师表》、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等，都是当时从事于政务活动的公文。

公文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历来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的：公文系“政事之先务”。据史书记载，东汉光武帝下诏考核官吏，凡不懂撰写书疏者，连同举

荐人一并治罪。有些君主对公文写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明太祖朱元璋因繁文困扰而鞭苔茹太素的故事，体现了对公文写作规律的尊重。

“洪武时，刑部主事茹太素疏论时务累万余言，太祖令人诵之再三，采其切要可行者五百余言。因叹曰：‘朕所以求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国家，彼浮词者，徒乱听耳。’”（引自《典故纪闻》）

朱元璋不仅把茹太素的洋洋万言删成五百字的短文，而且“定为建言格式，颁布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烦文”，一时使官吏们不得不写言简意赅的短文。

当然，在漫漫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这样的事毕竟是凤毛麟角。随着封建王朝的愈趋腐朽没落，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公文也陷进了不可自拔的泥沼。公文泛滥成灾，无实效可言。“上以文责下，下以文蒙上，纷纷移文积于官府，文示交于路衢，始焉羽逝，既而影灭。卒不知其纷纷然何为也。”官吏们玩弄公文游戏，百姓们深受戕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新的历史时期，使我国的公文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公文的重要作用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而且已被越来越多的干部所认识。198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指出：“国家行政机关的公文，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发布行政法规和规章，请示和答复问题，指导和商洽工作，报告情况，交流经验的重要工具。”高度概括了公文的重要作用和公文写作与处理的意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公文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公文是制订方针政策的文字形式，是建设两个文明的工具，是新构思、新观念的载体，是交流传播

信息的媒介。因此,加强公文写作与处理的学习,做好文秘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公文处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是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需要,是振兴经济和繁荣文化的需要,是改进机关作风和深化机关改革的需要。

古人说:“多读乃藉人之功夫,多做乃切实求己功夫,其益相去远矣。”学习写作固然需要名师指导,但多练多写,从实践中琢磨探索更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写好应用文,此书的编写者更有发言权。《常用公文写作与处理》的撰稿人和审稿人,都是省级机关的文秘干部和主管文秘工作的领导干部。他们既谙熟领导机关工作规律,又具有丰富的文秘工作实践经验。书中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公文处理的原则规定精神,又较系统地总结了机关文秘写作的新经验。因此,本书将给文秘工作者更多的教益与启迪。

本书与目前已出版的同类出版物比较,有自己的鲜明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

一是准确性。准确性是公文写作的普遍要求。本书由于有领导机关的严格把关,编写者本身又十分了解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制订的来龙去脉,并身体力行制作过各类公文,所以本书从政治观点、公文种类、公文格式、行文规则等方面,都比一般的书籍更为准确。因而,也就更有权威性。

二是新鲜性。领导机关是搜集、加工、发布信息的枢纽,文秘干部每天处理大批公文,接触大量的信息。本书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公文处理与写作的最新精神。而有的教科书由于信息不灵,仍按已废止的1981年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暂行办法》传授公文写作知识。本书的新鲜性还在于材料。书中引用了许多实际工作中的第一手材料,以及近两年来各级

领导机关的公文实例。这为一般的写作书籍所鲜见。

三是实用性。这首先是本书阐述的各类公文，就是常用的。如通知、报告、计划、调查、总结等，哪一个领导机关都不能不写。通过学习各种文体，学了就可派上用场。如第二十四节至第二十八节，介绍怎样写诉状，这对于依法办事就很有用处。本书从机关公文处理的实际出发，所指出的存在问题，有利于文秘干部发扬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是求是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从而提高公文撰写与处理的水平。如第三十四节所指出的公文种类、公文格式、行文关系、公文办理等方面的弊端，针对性很强，不仅初学文秘写作的同志要注意，就是工作多年的文秘干部也不能忽略。这些问题，如果编写者没有文秘工作的实践经验，是难以洞察的，即使看到了，也很难提出解决的办法。

从更高的标准来看，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也许是编者们工作繁忙，事务缠身，难于集中讨论修改，因而全书的体例、语体有些不够统一。有的语言流于口语化，缺乏书面语言的规范性。有的节或结构不严谨，或引例不典型。然而，总的来说，处于“满负荷运转”的文秘干部们，能在紧张艰苦的文字和事务工作之余，编写出这样一本有实用价值的应用文写作的书，精神可嘉，我打心底里佩服。

陈学璞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目 录

上篇概论

一	中国历代公文及其演变	(1)
二	公文的特点和作用	(7)
三	公文的格式	(11)
四	公文的行文规则	(16)
五	公文的办理程序	(18)
六	公文写作与处理的基本原则	(25)

下 篇 专 论

七	怎样写决定和决议	(29)
八	怎样写布告和通告	(34)
九	怎样写通知	(44)
一〇	怎样写通报	(57)
一一	怎样写报告和请示	(68)
一二	怎样写批复	(90)
一三	怎样写函	(97)
一四	怎样写会议纪要	(107)
一五	怎样写《政府工作报告》	(115)
一六	怎样写总结	(120)
一七	怎样写计划	(130)

一八	怎样写调查报告.....	(136)
一九	怎样写讲话稿.....	(148)
二〇	怎样编写简报.....	(161)
二一	怎样写可行性报告.....	(168)
二二	怎样写经济分析.....	(178)
二三	怎样写提案、议案	(185)
二四	怎样写上诉状.....	(197)
二五	怎样写起诉状.....	(203)
二六	怎样写调解书.....	(218)
二七	怎样写答辩状.....	(223)
二八	怎样写申诉状.....	(231)
二九	怎样写合同、协议书	(236)
三〇	怎样写介绍信、证明信	(262)
三一	怎样写贺信、慰问信、感谢信.....	(273)
三二	怎样写启事.....	(281)
三三	怎样写请柬.....	(284)
三四	当前公文处理中的弊病.....	(288)
三五	公文写作应注意的事项.....	(296)

附 录:

一、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	(306)
二、国务院公文主题词表	(315)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行政机关公文 处理办法实施细则.....	(322)
四、标点符号用法	(333)
五、编辑、校对符号.....	(344)

一 中国历代公文及其演变

公文是公务往来的各种书面材料的总称。它具有特定的格式、特定的使用范围，由特定的作者撰写的一种应用文体。一般以说明为主，兼有叙述、议论成份。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文，主要是指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在处理公务中所使用的各种文书。它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发布行政法规和规章，请示和答复问题，指导和商洽工作，报告情况，交流经验的重要工具。

公文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形式，是伴随着国家和文字的产生而产生，是人们公务实践的产物。正如斯大林所说：“生产往前发展，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国家的萌芽。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发展了，需要有条理的来往书信。”（《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18页）根据考古发现，我国现存的最早公文是殷商后期（距今约三千一百年至三千三百年）的甲骨文书。这些甲骨文书大部分是记载殷商王朝约二百七十多年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卜辞和记事刻辞，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殷商王朝的各种活动情况，是世界上最原始的分务文书之一。

六经之一的《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公务文书的汇编，其中收录了典、谟、训、诰、誓、命等六种公文文体。“典”是记载古代帝王政法的文书；“谟”是君臣就国家大事进行策划谋议的文件；“训”是国君训导臣下的文辞；“诰”是训诫勉励的文告；“誓”是出师讨伐时告诫将士的战争动员令；

“命”是朝廷用于指挥、颁布爵位、赏赐臣下的文书。这些都统称为书，“书，古之号令。”（班固《汉书·文艺志》）除上述六种外，春秋战国以前的公文，还有令、教、方、简、契、判、符、上书、檄等几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对公文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把“命”改为“制”；将“令”改为“诏”，把“上书”改为“奏”和“议”。此外，还有谕、敕、教、诰、檄、旨、策、议等文种。“谕”是天子用来谕告臣民的文书；“敕”是用以训戒州郡的文告；“教”是教化老百姓的教令，王侯所下达的文书也称为教；“诰”是责问治罪的惩戒令；“檄”是军事文书；“旨”是君王的谕旨；“策”用以封赠王侯的文书；“议”是指决定处理事情的适宜方案。

汉代继承和发展了秦代公文体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和严密的公文体系，对公文的名称、格式、用途及文书制度都作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文件的尺寸、起首和结束语的写法及行款数目，具名姓的等级规矩，都有明确的要求，还规定平件用青色封囊，急件用赤白二色封囊，密件用黑色封囊。当时，下行文有诰、诏、令、制、策等；上行文有章、奏、表、议等。南朝梁代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说：“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诫戎，诰以敷政。……降及七国，并称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戒敕州部，诏告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又说：“言事于主，皆称上书。秦初定制，改制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

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这些公文格式，基本上延续到清代。但在公文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朝代都创制和增加了一些新的文种：如魏晋时期有牋命、赦文、启等；六朝时期有贺表、列辞、签、牒状、告等；隋唐时期有发敕、敕旨、敕书、敕牒、批、判、堂帖、牋子、牋、咨报、箋、启、关、刺等；宋代有御札、敕牋、札子、故牒、公牒、咨、呈状、申状等；元明时期有敕命、下帖、牌面、勘合、照会、题本、揭帖、咨呈、牒呈、参评等；清代有札、牌、揭、祥、稟、折、谕帖等。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废除了历代封建王朝所使用的制、诏、诰、敕、题、奏、表、箋等旧式公文名称，颁布了一个公文程式条例，共有下列五种公文：令、咨、呈、示、状。此后，北洋军阀政府在原南京政府公文体制的基础上，曾多次修改并公布公文程式条例。其公文名称有：令、布告、状、咨、公函、呈、批等。国民党政府取代了北洋军阀政府后，对公文体制又进一步进行了改革，先后多次公布公文程式，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四年公布的公文程式条例，将公文分为九种，即令、训令、指令、布告、任命状、呈、咨、公函、批。其使用范围和含义是：令是中枢机关及省以上机关公布法令、任免官吏及军事指挥时所用的文书；训令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下行的指示性文书；指令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所呈报或请示具体问题的批复文书；布告是对公众宣告事项或进行劝诫的文告；任命状是任用官吏的文书；呈是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的请示和报告；咨是同级机关公事来往时使用的文书；公函是不相隶属的机关公事来往所用的文书；批是各机关对人民陈情的事项，在批准或驳回时所用的文书。

但公文的语体基本上仍沿用文言，也夹用白话，是一种半文半白的混合体。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起，伴随着工作机关的建立，就有了简单的公文，如布告、告民众书、宣言、通告、通电、通令、函、信等。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央工农政府制定的《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条例》，对文书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一九三八年四月，晋察冀行政委员会为了改革旧式公文程式，专门制发了《改革公文程式的理论和实际》的指示信，该指示信根据革命的需要，规定上级对下级的行文有指示信、复、函、令、下级对上级的行文有报告和请示。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序》，将公文分为主要公文和辅助公文，其主要公文有命令、布告、批答、公函、呈文五种，辅助公文有指示信、报告、快邮代电、签条、通知五种。命令、布告、批答、指示信为下行文；呈文、报告为上行文；公函，通为平行文；快邮代电和签条不分上下、平行，而签条限于在机关内部使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机关职能的扩大，各机关又增加了令、训令、指令、指示、决、批复、通报、报告、函、电等公文文种。全国解放后，为了更好地发挥公文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作用，我国政府先后四次公布了公文的体式和名称。一九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公文处理暂行办法》，规定了七类公文：①报告、签报；②命令；③指示；④批复；⑤通报、通知；⑥布告、公告、通告；⑦公函、便函。一九五七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出的《关于对公文名称和体式问题的几点意见》，把公文种类定为命令、令、指示、报告、请示、批复、批示、通知、通报、布告、通告、函。
一九八十年，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暂行办法》，把公文分为九类十五种：①命令、令、指令；②决定、决议；③指示；④布告、公告、通告；⑤通知；⑥通报；⑦报告、请示；⑧批复；⑨函。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了《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我国现行公文有十类十五种，其名称是：①命令（令）、指令；②决定、决议；③指示；④布告、公告、通告；⑤通知；⑥通报；⑦报告、请示；⑧批复；⑨函；⑩会议纪要。上述十类十五种公文，其中命令（令）、指令、决定、决议、指示、布告、公告、通告、通知、通报、批复、会议纪要等十二种公文为下行公文，是上级机关向下级机关发出的各类公文。它具有指导性、命令性、告知性等特点。请示、报告两种公文为上行文，是下级按照组织程式向上级请示问题、报告工作的公文。函为平行公文，是平行机关或不相隶属机关之间相互往来的公文。在这十五种公文中，地方基层行政机关常用的有决定、决议、布告、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函、会议纪要等十一种。此外，还有调查报告、简报、规定、细则、办法、意见、公约、守则、计划、规划、工作要点、总结等文种。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公文文种有越分越细、不断增加的趋势，如经济分析报告、可行性报告、协议、合同、启事、意向书、请柬等已成为处理公务的常用文书。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一些司法文书，如起诉书、申诉书、判决书、调解书、答辩书、公证书等也成为司法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常用的公务文书。党的十三大确定干部人事制度的实施，将对国家各类公务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正确地使用各类常用公文将成为每一个公务人员最起